

“坚持‘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统一”的哲学意蕴

黄自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统一,把“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作为湖南担当新的文化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新篇章的重要遵循。邵阳市荣膺“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后,持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把“坚持‘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统一”作为重要的战略思路与工作方法。我们要深入领会“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背后蕴含的哲学原理,推动各项事业向更高水平发展。

“坚持‘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统一”蕴含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口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使人民群众生活富足,是我们党执政的基本出发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脱贫攻坚取得的胜利,首先来自于经济建设成就,来自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从而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富脑袋”体现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凸显人民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用“八个更”总结了新时代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这“八个更”,既需要“富口袋”提供物质基础,也离不开“富脑袋”满足精神需求。

“坚持‘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统一”蕴含物质与精神辩证统一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用“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的关联表明物质对于精神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会促进社会精神财富的增长,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对社会物质生产具有推动力和引领力。但同时,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积极的、进步的、有益的社会意识形态即精神文明,不会自然形成;落后的、腐朽的、有害的社会意识形态也不会自然消失。因此,发展精神文明同发展物质文明一样,都离不开人的生产和推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比较之下,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实一点,精神文明建设虚一点;在提高人们素质的工作上,科学文化素质方面要实一点,思想道德素质方面要虚一点。实的比较好把握,虚的相对难以把握。”因此,必须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把“富脑袋”的虚功与“富口袋”的实功结合起来。

“坚持‘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统一”蕴含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筑牢“富口袋”的物质文明根基;也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实现“富脑袋”的精神文明发展。这二者的统一,彰显了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既是对物的全面丰富的实现,也包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物质财富

虽然得到了极大丰富,但是精神文明严重缺失。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野蛮的全球扩张与殖民掠夺。与此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阶级不平等等问题在西方社会泛滥。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避免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弊端,必然坚持“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统一,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

“坚持‘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统一”蕴含统筹推进、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实践方法论

当前,全国各地在践行坚持“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统一形成了诸多先进经验,比如浙江“千万工程”,将生态治理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深圳全方位打造“创新型”城市。这些宝贵经验可以提炼概括为以统筹推进、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为核心的实践方法论。统筹推进,即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同推进,并从整体和长远角度出发进行系统谋划。因地制宜,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地的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发展状态等具体情况寻求“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统一的路径。与时俱进,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和需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提升“富口袋”与“富脑袋”的现代化水平。

过去几年,关于“坚持‘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统一”的理念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领域得到实践。接下来,在现代文明城市建设、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同样不能偏离“坚持‘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统一”的工作思路。我们应坚持“富口袋”与“富脑袋”相统一常抓不懈,融入日常、做在经常,切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省委党校基地特约评论员,本文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2024年度教研咨一体化创新工程高质量课程开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提升干部队伍媒介素养赋能现代化治理

杨文国

全媒体时代,媒介不仅是舆论的风向标,更深刻影响着政策落地的精度、社会共识的凝聚度、风险应对的韧劲。提升干部队伍媒介素养,对夯实执政根基、守护政府公信、凝聚社会人心至关重要,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无法回避的战略性工程。

媒介素养: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刚性需求

媒介素养的核心,是干部在复杂舆论生态中科学驾驭传播规律、精准引导社会预期、有效化解公共风险、主动塑造治理形象的综合能力。

提升干部队伍媒介素养是应对全媒体挑战的“刚需”。全媒体传播格局消解了传统信息壁垒,实现了瞬时、全域、交互式的“人人传播”。这对政府信息发布的时效、精准与权威构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干部若对媒介环境的深刻性认识不足、驾驭能力欠缺,极易在信息洪流中失语失焦,导致治理意图的传递受阻,治理效能大打折扣。

提升干部队伍媒介素养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密钥”。公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与参与诉求的日益高涨,要求治理过程更加透明、更具回应性。干部媒介素养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政策能否穿透信息迷雾有效触达公众,社会关切能否得到及时、真诚回应,以及多元声音能否在理性对话中凝聚成推动发展的共识,并关乎政策的有效传播与执行。

提升干部队伍媒介素养是守护公信力的“利器”。在全媒体时代,政府形象与公信力的建构,已深度嵌入干部个体与媒体、公众的每一次互动细节之中。干部的媒介表现,成为公众感知政府作风、效能与温度的直观窗口。坦诚沟通、专业应对、有效疏导,能显著累积宝贵的公信力资源,维护和提升党和政府公信力。

提升干部队伍媒介素养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备“盾牌”。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阵地和社会风险酝酿的温床。网络舆情的突发性、复杂性、裂变性显著增强,对维护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提升干部对舆情的敏锐感知、科学研判和高效处置能力,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筑牢安全底线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媒介素养不可或缺的核心维度。

善用媒体:提升治理效能的战略支点

媒体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领导干部要主动拥抱媒体、善用媒体,提升媒介素养。

首先要学会设置议题,掌握“话语权”。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有效掌握舆论主导权,需紧密围绕中心工作、重大政策和民生关切,精心策划传播主题,增强时代感、感染力、说服力,综合运用线上线下渠道,抢占信息发布和权威解读的先机,引导公众进行理性认知和建设性讨论。

其次要懂得创新表达,让主流“入心”。深刻理解并娴熟运用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数据可视化等新兴传播形态,用网言网语、百姓视角、鲜活案例重塑官方话语体系,使政策解读更通俗、更形象、更场

景化。积极探索运用新媒体平台进行政策宣讲、公共服务推介、政民互动等,让主流声音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更具亲和力 and 穿透力。

还要学会构建伙伴关系,实现“双向奔赴”。政府与媒体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合作伙伴。领导干部应建立与主流媒体、新兴平台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沟通协作机制。通过定期举办媒体座谈会、通气会;线上交流等增进相互理解;以开放、坦诚、合作的姿态,为媒体采访报道提供必要支持,共同致力于营造健康清朗、理性有序的舆论生态,进而实现政策决策目标与改革发展实践的“双向奔赴”。

精准拆弹:锻造舆情治理硬核实力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小事件可能引爆大危机,必须前瞻布局,推动舆情治理从被动“灭火”转向主动“防火”和系统治理。

关口前移,构建全时全域监测体系。首要在于构建覆盖广泛、反应灵敏、分析精准的全时全域舆情监测预警体系。强化技术支撑与专业研判相结合,对重点领域、敏感节点、潜在风险进行常态化扫描,力求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研判、早介入。尤其在突发事件或敏感议题爆发之初,必须争分夺秒,第一时间发布权威、准确的信息,阐明事实、表明立场、回应关切,有效压缩谣言滋生空间,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法治理性,处置之道在于真诚沟通。始终秉持法治原则与理性态度,坚决摒弃“捂盖子”“删帖子”“硬对抗”等简单粗暴且适得其反的做法。牢牢根植于事实真相、法律法规和理性沟通,对于属实的批评监督或暴露的问题,要勇于承认、诚恳致歉、迅速整改、及时反馈,展现责任担当;对于不实信息或误解误读,则摆事实、讲道理、列数据、亮证据,进行清晰、有力、专业的澄清释疑。

制度支撑,推动能力跃升。常态化治理。舆情应对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体系化、制度化、专业化的支撑。应将舆情管理深度融入应急管理体系和国家安全体系进行整体谋划。着力组建一支融合传播、法律、心理、业务等专业背景的复合型舆情应对核心团队;制定完善分级分类、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对干部危机传播管理的专业培训和实战模拟演练,使其熟练掌握信息发布节奏、情绪疏导技巧、议题管理策略和形象修复方法,推动舆情处置从依赖个体经验的“应急反应”向依靠制度规范的“常态治理”跃升。

源头治理。更深层次看,舆情往往是现实矛盾在线上空间的投射。提升媒介素养的根本之道,在于同步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必须强化重大决策前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审慎研判社会接受度和潜在舆论风险。同时,要着力畅通线下诉求表达和问题解决的制度化渠道,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减少负面舆情的滋生土壤,实现标本兼治。

(作者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



邵阳红色历史传承中的统战智慧

严 琰

在中华民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邵阳这片红色热土,从蔡锷的护国运动开始,历经塘田讲学时期,再到红军长征留下的足迹,已积淀起红色历史传承中丰厚的统战文化底蕴。传承红色基因,创新统战实践,构建起富有时代特征的统战工作全新格局,必须深入挖掘邵阳红色统战资源的历史价值。

蔡锷护国战争中的统战策略

蔡锷是护国运动中极为出色的领袖人物,他所秉持的统战思想以及开展的相关实践活动,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护国战争极为关键时刻,蔡锷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统战智慧。他实行“军事同盟加政治协商”的双重策略,成功地构建起了针对袁世凯复辟的反袁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最为关键之处就在于,它一方面十分重视对军事力量的整合,另一方面也极为注重对各相关方的政治立场予以协调,这无疑很好地体现了统一战线所遵循的“求同存异”这一基本原则。

蔡锷所开展的统战实践活动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有着深厚的现实意义。他通过联合云南、贵州等地区的力量,构建起了“滇黔川三省联动”的反袁态势,这样一种跨区域协同作战的方式,为现代统战工作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护国军所制定的《护国军纪律条例》明确“严禁

扰民、抢掠、强征财物”这样的军纪规定,充分展现了“军民一体”的统战观念。在沪纳战役期间,护国军采用“军事打击与政治宣传相结合”的办法,争取地方势力支持,最终成功联合贵州刘显世部一同作战,这种“硬实力与软实力同等看重”的统战手段,直到现在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塘田战时讲学院的统战办学实践

塘田战时讲学院素有“南方抗大”之称,其办学模式以及统战实践活动,给新时代统战工作带来了许多重要启示。讲学院运用创新性的“三三制”师资结构——也就是共产党员、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各自所占比例均为三分之一,这样多元化的师资配置方式,很好地彰显了统一战线所具备的包容性以及开放性特点。

讲学院的课程设置很好地契合了当时统战教育的时代要求,还特意开设了诸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类课程,全面且有条理地传播统战理论以及相关实践经验。在不到一年的办学期间,讲学院成功培育出了250余名进步青年,其中有40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还建立起5个地下党支部,进而成为湘西南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极为重要的一个基地。这样的成果有力地证明了统战教育在人才培养及思想引导这两个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讲学院积极践行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员

前往农村地区开展“抗日宣传+扫盲教育”,在塘田市镇周边设立了12所夜校,编写了《战时民众读本》等相关教材,促使统战理念能够渗透到基层,走进人们心中。

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团结政策

邵阳是红军长征重要经过地,先后有红六军团、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三大红军主力途经邵阳,历时近30天。

红军长征经过邵阳期间,深入实践以民族平等为核心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保障信仰自由、联合各民族同胞,成功争取了各族群众支持,为战略转移创造了关键条件。红军过邵期间所开展的民族团结相关实践活动,为新时代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红军长征在城步的老山界留下了诸如“百步坎互助”“一条棉裤”等感人至深的故事,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一直坚守的民族团结理念。

在隆回鸭田战斗期间,红军推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争取到苗族群众的有力支持,当时有49名青年踊跃投身红军队伍,充分彰显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所具备的强大感召力量。在绥宁鸡公坡战斗结束后,红军主动帮助侗族群众组建起“农耕互助组”,这些都是红军长征过邵期间民族团结工作的典型案例。

历史实践证明,民族团结和统战工作,必须秉持平等相待及互助合作这样的基本原则,要凭借具体的惠民政策、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来获取各族群众的信任与支持。邵阳红色传承中的民族团结及统战智慧,是新时代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重要经验。